

高启、谢肃、王璠文集的三种初刻本

陈杏珍

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 明高启撰 明景泰刻本 明叶盛、清叶棐跋

高启（公元1336—1374年），字季迪，长洲人。元至正丁酉，张士诚据平江，谘议参军饶介览高启诗，惊异以为上客。启谢去，隐吴淞江之青丘，自号青丘子。明洪武初，召入纂修《元史》，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，复命教授诸王。洪武三年七月二十八日，与史官谢徽俱对，擢户部右侍郎，徽户部郎中。自陈年少不习国计，且孤远不敢骤膺重任。徽亦固辞。并赐内帑白金放还。退居青丘，授书自给。苏州知府魏观为高启徙居城中夏侯里。观改修府治，启为之作上梁文，观被劾死，启连坐腰斩，年三十有九，时洪武七年。

明初法网森严，明太祖以专制自雄而闻名，动辄兴大狱，功臣名士或死或遁，不少人身名俱沉，连行状、墓志都没有留下。高启被杀的真相，史书讳莫如深，传中不作记载。他由之获罪的上梁文，集中不收。是官府查禁此文，还是家人为避祸而销毁，后人不得而知。一般认为，他尝赋诗，有所讽刺，触怒太祖，当时太祖嫌之未发，事后借故治罪。

高启是明初文坛上的重要作家，他的诗称一代之冠。他与杨基、张羽、徐贲齐名，称“吴中四杰”，又与王彝、杨基、杜寅、张宪、张羽、周砥、王行、宋克、徐贲定交，号“北郭十友”，也因能诗而号“十才子”，然高启的成就远出九人之上。王祚说：“季迪之诗，雋逸而清丽，如秋空飞隼，盘旋百折，招之不肯下。又如碧水夫渠，不假雕饰，翛然尘外。”谢徽说：“季迪之诗，缘情随事，因物赋形，纵横百出，开合变化，而不拘拘乎一体之长。其体制雅醇，则冠冕委蛇，佩玉而长裾也。其思致清远，则秋空素鹤，迴翔欲下，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。至其文采纒丽，如春花翘英，蜀锦新濯。其才气俊逸，如泰华秋隼之孤鹫，昆仑八骏追风蹶电而驰也。”（见《缶鸣集序》）周忱称高启之文，“意精而深，辞达而畅，有温纯典则之风而不流于疏略，有谨严峻洁之度而不涉于险僻，该洽而非缀缉，明白而非浅近，不粉饰而华彩自呈，不追琢而光辉自著。盖由其理明气昌，不求其工而自无不工也。”（见《高太史凫藻集序》）

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：高启缶鸣集十二卷，自选。又凫藻集五卷，文。又扣舷集一卷，词。又姑苏杂咏一卷。又槎轩集十卷：启诗有凤台、吹台、江馆、青丘、南楼、槎轩诸集，成化中吴人张习企翱得其遗稿，辑为是编，总目曰槎轩。又高季迪大全集十八卷，景泰中吴人徐庸编，刘昌钦谟序。

高启在短促的一生中，写下了如此众多的诗文，显示了他的超逸才华，如能尽其天年，其造诣当不止于此。

北图入藏高启诗文的早期编刻本数种，其中极为珍贵的有：

高季迪赋姑苏杂咏一卷，明洪武三十一年蔡伯庸刻本。此书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高太史凫藻集五卷，明正统九年郑顥、邵昕刻本。此书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惜其所附《扣舷集》一卷已佚，而南京图书馆有完整的藏本。

槎轩集十卷，附录一卷，明成化十三年张习刻本。此书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一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

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，明景泰刻本。

这里着重谈一谈《高太史大全集》。

此书名为大全，实际只有高启的诗集。它以《缶鸣集》为蓝本，按体裁增广而成书。高启生前，自选《缶鸣集》十二卷，计诗九百余首。高启歿，无后，其妻周氏藏弄其遗稿，授其内侄周立公礼，周立益加考订，校正重编足一千首，于永乐元年镂版行世，正统末毁于火。至景泰初，徐庸用理掇拾遗佚，会梓成《大全集》，号称二千篇，事见《大全集》诸序。书中前题下署“吴郡高启季迪著，南州徐庸用理编”二行，卷前有景泰元年十二月望日进士刘昌序，又有洪武二年胡翰序、洪武庚戌王祎序、洪武三年谢徽序。

北图现藏《高太史大全集》早期刻本三种，一为明景泰刻本，此书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，版框高17.2厘米，宽12厘米。二为景泰刻成化五年刘以则重修本。三为无年款明刻本，约刻于明正嘉间，此书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，版框高18.5厘米，宽12.4厘米。

一九一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《大全集》收入《四部丛刊》中，注明所据底本为“江南图书馆藏明景泰刊本”，此底本为丁氏旧藏，丁丙有跋，见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。此后，商务印书馆因底本内有补抄之叶，间有差字，又卷内原有墨钉，而北图收藏一部，曾是查莹藏书，则大致校补添写，一一可读，故再据北图本影之（见王重民先生著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）。查莹和丁丙的藏本同版，均为白口本。

这样，产生了一个疑问：白口本与黑口本，究竟哪一部是景泰初刻本？

经比较，黑口本与白口本有几处明显的区别：

(一) 北图收藏高启著作的初刻本，全为黑口，保留了明朝早期刻本的特色，而白口本《大全集》，版刻上有明朝中期刻本的特征。

(二) 黑口、白口两种《大全集》，卷前均有刘昌序，但黑口本序文的字体写刻自如，白口本序文的字体则稍显拘谨呆板，这是临摹、翻刻的结果。

(三) 黑口本刘昌序末有墨印三枚：“钦谟”、“京闱甲子解元”、“春闱第二人”，白口本序末无印记。

除了上述这一部黑口本外，北图还得到了傅增湘先生收藏的一部黑口本，从而为此书的鉴定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。傅本有永乐元年周立序，序后附王益跋文五行，如下：

“《缶鸣集》，乃永乐初周公礼始刻诗一千首，至景泰初徐用理重刻诗二千首，印行久矣。今用理以板付益藏之，乃增太史公并周君序于前，李志光传于后，庶知此集权輿于公礼，尽美于用理也。姑书此，记始末，俾读诗者鉴知。戴溪王益谨识。”

可知傅本是王益得版以后才印刷，属后印本。傅本卷末有大字刻《题高太史大全集后》跋文一篇，云：

“姑苏高太史平生所为诗若干篇，郡人徐用理类而编之，名曰大全集……是集也，吾邑漕溪思学刘公宗文昔既助刊，历岁滋久，字画漫灭。厥胤以则虑久而湮泯，又恐传之不广，而四方学之者鲜得观习，重行补割，以广其传，来属序于予，故不以鄙陋辞，谨书此于末简，俾世之人知刘氏世德之相绍而不殁人善如此，则太史是集亦赖以传之永久而不朽焉。成化五年屠维赤奋若之岁嘉平月朔，修职郎、南京国子助教、前乡贡进士、海虞高德书。”

由此得知，这是景泰刻版、成化五年刘以则补版重印本，书中有王益增添的《前史官高启自序》、永乐元年周立《缶鸣集序》及

洪武乙卯李志光撰《高太史传》。

重修本卷末有吴慈培朱笔跋文，云：“傅丈先得白口本，无刻书序跋，审字体似出正德嘉靖间，继又得此本，因以前本归余。”有此重修本作依据，又有傅、吴二位的鉴定，黑口本为景泰刻本自是确定无疑的了。就是说，《四部丛刊》景印的，不是景泰间徐庸刊本。

景泰刻本和景泰刻、成化重修本的卷末间有助刊人姓氏，但两书所刻助刊人姓氏稍有差别。

景泰刻本：卷一后“常熟钱允言助刊”，卷二后“常熟钱允辉助刊”，卷三后“崑山王宗器助刊”，卷八后“常熟陈宗盛助刊”，卷九后“常熟陈原锡助刊”。

而重修本，卷八末铲去助刊人姓氏，卷十四末补刻“常熟刘宗文助刊”一行，这样，成化五年高德所言“吾邑漕溪思学刘公宗文昔既助刊”一语，就产生了真伪问题。刘宗文是不是助刊人？在没有旁证的情形下，人们只能以初刻本为依据。世人看重初刻初印本，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吧？

北图藏景泰刻本，曾经明代著名藏书家叶盛收藏，书中有“叶盛私印”、“叶德荣甫世藏”、“叶氏藏书”、“子孙永保”等印记。书中有叶盛题跋云：“前辈文学家，其集多手自编定，或自命名，如前、后、续、别之类，盖皆有微意存，非如今之人，苟简无谓之为也。高先生尝选诸集，为《缶鸣集》凡九百三十七首，周公礼足成一千首，既失之矣，徐庸以多为尚，又为创号大全，至以《姑苏杂咏》妄自删易其题，拆补其中，尤为可笑。噫，是岂知前辈不以夸多斗靡为尚哉？及庵志。”这段跋文对今人也不无教益。但是徐庸的汇编本，确定了高启诗集的基本规模，后世相袭沿用，成高集的通行本，至清雍正年间，金氏文瑞楼汇刻高启全集，其诗集的编次仍依《大全集》，徐庸的功绩不可磨灭。

传世的《大全集》均为十八卷，疑非足本：其一，此书名为大全，却只是诗集，无散文和词类。其二，景泰刻本卷前缺目录，未标明总卷数。其三，刘昌序称：“故嘉议大夫、户部侍郎、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、授诸王经、青丘先生高启文集二十四卷，旧一千若干篇，今二千若干篇，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广也。”可见徐庸所编，应为二十四卷，共两千篇。傅增湘先生曾对景泰刻成化重修本中的诗篇作过统计，写下题记：“全集共一千七百六十九首，戊寅八月杪藏园检记。”吴慈培跋文中又指出：白口本比黑口本多诗三首。总之，无论黑口本还是白口本，总数都不足二千篇。高启有文集五卷，词一卷，或者徐庸所编本包括散文和词类？这个疑问，尚有待考证。

密庵稿五卷文稿五卷 明谢肃撰 明洪武三十一年刘翼南刻本 清汪鏞跋 傅增湘校并跋

谢肃，字原功，别号密庵。上虞人。少与唐肃齐名，于时称“会稽二肃”。尝从贡师泰游，元末试江浙乡闈，未中。洪武中举明经，历官福建按察司佥事。坐事被逮，太祖御文华殿亲鞫。肃大呼曰：“文华非拷掠之地，陛下非问刑之官，请下法司。”乃下狱，狱吏以布囊压死。行事见《列朝诗集小传》。又集中刘翼南后序称，“洪武十有六年冬而密庵领荐于朝，出金阊宪”，提供了出仕的年月。

谢肃以文章政事著名当世，其友戴良在序中说：“原功之文肖其为人，其立论闳以正，其书事简以悉，其序记铭赞雅健而奇警，其诗歌彬蔚而秾丽，庶几杰出一时，流辈无敢与并者。”又说：“原功之诗，五言古律则本之□魏，歌行则遵李杜，近体则祖少陵，六朝晚唐无论焉。他若山川之离合，土地之沿革，人物之废兴，可以正史策之讹谬、补志之缺略者，则又等前数人而上之。纪行之诗，而至原功可谓盛矣。”刘翼南在序中说：“密庵

之诗，补志阙，证史缪，动关世教，足厚风俗。”

此书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版框高18.2厘米；宽11.6厘米。全书以天干分卷。《密庵稿》为诗集，自甲卷至戊卷，前题下署“门人始宁任守礼校正 沛郡刘翼南编次”两行。文稿自庚卷至癸卷，前题下不署名氏，从刘翼南“后序”得知，文稿也是刘翼南编次。

此书中有抄配的刘翼南《密庵诗稿后序》，云：“余自幼时，余先人常率余拜从姑之夫密庵于荪溪……其歿后之六年，余亦察荐于天官，遂得拜命南宫，哀密庵所著诗文凡十卷，编类成帙，置诸座右，尝与四方往来鸿生硕彦相加订证，阅八年，始克先锓梓诗，然诗五卷，卷以天干为第，其卷文帙亦如之……洪武戊寅春正月上丁沛郡刘翼南谨序。”后序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刻书时间和刻书人的文字依据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《明史艺文志》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、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俱载肃《密庵集》十卷，而传本久稀，藏书家罕著于录。惟《永乐大典》中所收肃诗文颇多……谨采掇编次，厘为八卷。又戴良原序二首，别见《九灵集》中，今并取弁简端，以略还其旧焉。”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著录：

“《密庵集》十卷，金氏文瑞楼犹藏其书，年深湮没。”可见四库馆臣未见原著，一些著名藏书家也不作著录。此书能传下来，而且入藏于国家图书馆，无疑是藏书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。

书中有清人汪鏞墨笔跋文一叶，“云：“明谢氏肃当元末尝从贡师泰游，所作诗文折衷于师泰者为多。其《密庵集》，前五卷为诗，后五卷为文，以天干分卷，世久失传。嘉庆庚辰购自楚中旧家，惜其残阙太甚，又佚去诗集戴序一篇。余以其集世罕传也，手自补葺，装池而藏之。按《简明目录》称，《密庵集》原本久佚，系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成八卷。是四库馆纂修时，亦未见其原集，余意外得之，如贫儿暴富，喜何如也，爰识原委于卷

端，道光元年太岁辛巳冬十月十九日晚香居士汪鏞识。”下钤“汪鏞颂堂”一印。

书中有洪武二年春正月望日金华戴良撰《密庵文稿序》，系洪武刻版。又有戴良撰《密庵先生稿序》，系诗稿序，抄配。书中还保留了明代重刻本的几篇序跋，俱抄配，计有：隆庆改元族玄孙谢讷序，隆庆元年从孙谢瑜序，隆庆三年从孙谢师严跋，天启五年七世从孙谢伟序。从而得知此书尚有隆庆刻本和天启刻本。

本书有目录，其一至五叶（即甲集至丁集）抄配。

傅增湘先生校补了本书，并作题记，甲卷末记：“己巳七月二十四日宿暘台山麓古清水院，用天启重刊本对勘”。戊卷末记：“假夏闰枝前辈天启刻本补填阙字，己巳八月二十一日书潜记。时入秘魔崖已五日矣”。

青城山人诗集八卷 明王璉撰 明正統十二年華靖刻本

王璉，字汝玉，以字行。长洲人。自号青城山人。年十七，中浙江乡试。洪武末，以荐摄郡学教授。后擢翰林五经博士，进检讨，再进春坊赞善，预修《永乐大典》。仁庙在东宫，特深眷注。尝与群臣应制，撰《神龟赋》，汝玉居第一，解缙次之。汝玉后进，声名大噪，出诸老臣上，又与解缙、王偁辈互相矜许，遂被轻薄名。坐解缙累，下诏狱死。洪熙初，赠太子宾客，谥文靖，遣官祭于其家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王璉曾学诗于杨维桢，是明初有影响的诗人。景泰时邹亮称他的诗“兼备古人之体制”，徐理称：“其为文盖兼古今体制，而诗则深得唐法……予尝评公之诗，清而不刻，丽而不靡，跌宕而不粗俗。骤而见之，如九霄一鹤，盘云独游；如玉井莲华，浥露初发；如瑶台仙子，临风微步，殆难以尘情凡态想象；如五陵年少，衣轻策骏，驰骋春风紫阳间，意气奕奕，不可奈品而第之。其大历、贞元诸才子之流乎？”（见本书序）

《青城山人诗集》刻本难得，黄丕烈仅藏旧抄本，且失四卷以下，后以书肆所见宋宾王校本参之，前缺魏、刘、徐、邹四人序。黄丕烈写下题跋二则，其一云：“此王青城集，余得诸五柳居书肆，昆山孔氏所藏书也。汝玉为吴人，考杨循吉《吴中故实记》所载《风雅第五》，凡十四人，青城王先生汝玉居首，记云：青城王先生汝玉诗豪放，有宠，永乐间与王偁、孟杨、解缙、王达善，同名当时，称东南五才子。今录其语于集尾，以征吾郡之文献云。堯圃黄丕烈。”（见《堯圃藏书题识》卷九）青城集善本之难得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此本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版框高18.1厘米，宽12.4厘米。前题下署“太子宾客谥文靖吴门王汝玉”、“隆亭华靖编次”二行。版心除卷一、二、四、六、七、八第一叶刻“青城诗集”外，余皆刻“青城集”。卷前有魏、刘、徐、邹四人序，由序言得知刻书人为华靖。

书中钤“卧菴所藏”、“朱之赤印”、“千秋里人”、“正气堂”、“蕉林梁氏书画之印”、“蕉林藏书”、“吴重熹字仲懌号心樵”等印记。大藏书家朱之赤、梁清标等人的印记，为本书增添了价值，足以表明此书确为前人所推重。

在编辑全国善本书总目的过程中，见到北大图书馆入藏的华靖刻本《青城山人诗集》，书中有李盛铎跋云：“王青城诗集，明刻传本甚希，宋廛所收尚系抄帙，罕可知已。壬子夏日析津市出此本，因亟收之。据堯圃题跋，尚有景泰间人魏、刘、徐、邹四序，是本已阙，当觅旧本补录之。盛铎记。”

北大藏本缺魏、刘、徐、邹四序，但保存了正统十二年王铠“后序”，为鉴定版刻年代提供了确切的依据，现将后序文移录于下：

“右青城诗集若干卷，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。大父自幼以诗文名，接交当时海内儒硕非一，往来倡酬，靡不见之

赋咏。自入国朝，登仕籍，洎升翰林，声光益著。其制作特盛，然两为回禄所虐，稿皆残缺。所幸别或收贮，得十之二，阅岁既久，铠以菲才宦游古汴，束以自随，公暇因撮拾分类，缮写一帙，有外集者附之，藏之篋中，家居以来，罔敢失坠。偶姻好华君彦谋过而见之，三复嗟叹，遂于内各删百首，命工刊次。呜呼！大父文名盖一世，著述布天下，而遗稿灰灭无几，又弗克传世，岂造物者不使有见于后哉？实子孙不肖，不能继述先业之所致也。今大父歿余三十年，而一旦幸表而出之，是明珠宝剑之起于重渊，必有待其时欤？彦谋读书好义，尝辑其族谱诸集行世，足美故家子孙，立志超卓，不屑细故如是。时正统十二年嘉平望日孙铠谨识。”

以北图藏本中魏、刘、徐、邹四序与此“后序”作对照，此书的版刻时间就可以确定了。

景泰元年魏骥序称：“兹吴门华君汇粹先生之诗凡若干卷，欲命工以锲于梓，征予序其首简”。

景泰元年刘铉序称：“太子宾客、文靖王先生诗一编，吴邑华彦谋既为锲梓，致书来北京请序之。予久未复，又书趣之，又未复，如是者三四。”

景泰二年邹亮序称：“乡友华彦谋雅擅好事之誉，尝编次先生之诗，寿梓以传于后，征序其端。”

景泰癸酉（四年）徐瑄序称：“友人华彦谋家与王氏连姻，尤好公诗，既为编次，复锲梓以传于世，而诿予序。”

可见，此书由编者华靖在正统十二年至景泰四年间刊行，是《青城山人诗集》的最早刻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